

文化拯救

近现代名人与教科书

吴小鸥著

文化拯救

近现代名人与教科书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5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化拯救：近现代名人与教科书 / 吴小鸥著.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5

ISBN 978 - 7 - 100 - 11662 - 6

I . ①文… II . ①吴… III . ①教育史—研究—
中国—民国 IV . ①G529.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45973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文化拯救
——近现代名人与教科书
吴小鸥 著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北 京 冠 中 印 刷 厂 印 刷

ISBN 978 - 7 - 100 - 11662 - 6

2015 年 11 月第 1 版

开本 880×1230 1/32

2015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17 1/2

定价：49.80 元

目 录

论教科书(代序) 张楚廷	1
自序	5
张之洞:古稀之年的新锐视野	15
从“科举”到“科学”	17
“当今第一通晓学务之人”	21
别样的《张相国新撰唱歌教科书》	29
题字《音注华英蒙学图说》	40
严 复:一代大师的启蒙情怀	47
学习“轮船驾驶”	48
“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	55
《天演论》成为震撼中国的教科书	59
《论小学教科书亟宜审定》	64
张元济:中国现代教科书之父	75
西学与西书	77
一流的教科书编纂队伍	87
中国第一套现代意义教科书	93
书卷就这样展开	99

蔡元培：凝重与深厚的奠基者	114
年轻翰林浩然弃官归里	115
编译修身、伦理学、妖怪学教科书	123
校阅官话识字、国语、党义教科书	131
志同道合的编撰出版群体	136
杜亚泉：卓越的科学启蒙	146
幡然改志	148
创新的《(绘图)文学初阶》	155
百余种新式理科教科书	163
文化论战及《人生哲学》	173
沈心工：学堂乐歌的筚路蓝缕者	181
中国首届师范生	182
参编《蒙学课本》	190
学堂里飘出的歌声	196
刘师培：独树一帜	212
革命党中的风云人物	213
国学保存会及国学教科书	221
集中编撰乡土教科书	241
陆费逵：应时而上的教科书革命	248
出版业奇才	249
民国第一套教科书	258

开创教科书新天地	267
反对教科书“国定制”	283
陈独秀：造就新青年	291
“抡才大典”的刺激	292
编辑《小学万国地理新编》	296
夭折的《新体英文教科书》	305
语言文字改革及教科书	310
胡适：何妨为书而生	324
新式课本的启蒙	326
倡导“文学革命”与“新式标点”	335
尊重儿童个性的新学制改革	339
著述、选注、校订中学教科书	344
任鸿隽与陈衡哲：一同走过	353
相遇在大洋彼岸	354
撰写与校订新学制教科书	361
《一个关于理科教科书的调查》	371
大胆质疑党化教育及其教科书	375
林语堂：最有名的维权官司	382
腹有诗书气自华	384
编英文教科书畅销全国	391
民国第一教科书案	403

朱家骅：提高国民知识水准	411
青春在革命中燃烧	412
“党义课”改为“公民课”	417
创设国立编译馆编审教科书	421
大名赫然印在课本上	428
陈立夫：教育不可一日中断	435
抗战时期教育部长	436
“国定本”的强力推出	446
主编《公民》与《童子军》	451
推动边疆与华侨教科书	457
叶圣陶：养成儿童正确精神	465
近二十年的“粉笔生涯”	466
《开明国语课本》深受欢迎	469
“国文”、“国语”到“语文”	475
致力于新中国教科书	486
附录 1：中国近现代教科书的部分编撰校订	
出版者名单	495
附录 2：杜亚泉编译、编撰、编辑、译订、校订的	
部分教科书	503
参考文献	512
后记	537

论教科书(代序)

张楚廷

我一直不愿意受命写序，尤其是年轻作者，我总希望他们自己写序。

所谓序，在我看来，就是为一部著述拉开序幕，或者说明一下学作的原委，写作的构思，大致的框架，介绍基本的内容，也许还说到相关的意义和学术价值。

如果自序，这些问题都比较容易说清楚；如果他序，即使仔细阅读过了，也不一定说得到位，很可能不痛不痒，不着边际。这就是我不情愿为他人写序的原因。我努力坚持不写，但有过少数几次失败。这一次，就是吴小鸥了，当她开始提出时，我拒绝了。后来想想，这些年来，她在教科书的研究上，可算是孜孜以求，做了不少的工作。于是，就想赞许一番；又想到，这需要我来赞许吗？所以真的还是很犹豫的。

作序不能喧宾夺主，归根结底，还是靠她的著作本身说话。我仅冒昧在此小议一下教科书及其研究的意义，当然也就认定了吴

小鸥工作的意义。

大中小学,乃至研究生阶段,都有教科书的问题。通常,教科书的编制、选用、实施和修订等事项统称为课程建设。这是各级学校的一项基本建设。

课程研究及其建设在教育学研究的整个领域里具有独特的地位。可以作一个比喻,课程研究,在物质世界就相当于基本粒子的研究,在精神世界里就相当于对人的心灵的研究。

古希腊人不一定作了如上的理解,但他们神话般的智慧,让他们在物质世界里就提出了单子的概念,而对此之研究,一直延伸到今日如希格斯这样一些杰出物理学家的研究;而在精神世界,在人的精神方面,则早已有了希腊人关于灵魂学的深刻探求;并且,古希腊人也留下不朽的教科书或课程,至今,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仍是欧美大学生必读的课本,而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几乎为全世界学校所采用,版本方面只有形式上的些微差异,基本内容却恒久不变。

我是学数学出身的,又被迫转向教育学和哲学。我先说一下数学。我国的中小学数学教科书是由哪些人主持制定的呢?他们是华罗庚、吴文俊这样一些世界级的数学家直接领导和参与的。

顺便,我想说一下,大中小学教科书制定的不同特点,由此而进一步说明中小学教科书的特殊困难、特殊意义与作用。

大学里的教科书,尤其是专业性的教科书,大都是教授们自己

编制和撰著的,自己开设什么,就写什么,教什么。也就是说,很少有国本课程、地方课程,也没有校本课程。

对于大学教科书的主要要求就是尽可能站在学术最前沿。然而,对于中小学教科书的要求就大不一样了。

中小学教科书至少要思考这样一些问题:那个相关课程的知识领域有多宽?哪些知识是该领域里的根?哪些知识是对青少年持久有用的?哪些知识对他们的未来发展是最重要的?哪些知识是他们时下的心理年龄便于接受的?或者,需要经过怎样的编撰和处理才可能是便于习得的?

由此亦知,只有那些能高屋建瓴、居高俯视的大学者才能比较准确和深入地回答这些问题。

这也就是吴小鸥在研究教科书时竟发现有那么多名家的缘故,这就是在这些编撰者中有严复、蔡元培、胡适、任鸿隽、林语堂、朱家骅等名人的缘故。

换句话说,大学是求得枝繁叶茂的问题,而中小学则是求得知根知底的问题。每个学科都有自己的根,为何中小学所涉及的根更值得关注呢?

我们知道,中小学里最重要的课程是语文和数学。这里的语文是母语。所有国家的基础教育阶段都必须学好自己的母语,同时,数学可以说是一种世界语言,其基础部分是世界各国学校都必须通过课程而研习的。

最后还简要地说一下教育科学。

人们更多知晓的是，康德这样大智慧的人物的主要贡献在宇宙学和哲学方面，殊不知，他有一部名著就叫《论教育学》，他对教育学也有杰出的贡献。

如果说到了教育哲学，其开篇之作也是一位德国人逻逊克兰兹。在中国，最早的则是范寿康等这样一些名人。教科书必然与名人相连。

在作了这样一些只言片语的叙说之后，想必对于吴小鸥在相关工作上取得的成就多有赞美之辞就很自然了。

二〇一四年元月六日

自序

一百二十年前的甲午战争，给中华民族带来亡国灭种之危机，激发出一代知识分子强烈的拯救欲。他们从西方发达的科技和昌盛的物质文明中，深感自身的贫穷与落后，从西方自由平等思想和民主制度的盛行中，看到千年封建社会的流弊。在暮色四合的清季天空下，1895年，严复在《直报》上连载《原强》一文，痛言“民智已下矣、民德已衰矣、民力已困矣”，并完整阐释了“开民智、鼓民力、新民德”之说。¹ 同年，康有为联络在北京参加会试的举子们，奋笔疾书一万余言的《上清帝第二书》（即《公车上书》），呼吁“才智之民多则强国，才智之士少则国弱”²，后来还提出“欲任天下之事，开中国之新世界，莫亟于教育”³的著名论断。1896年，梁启超愤懑于各

¹ 王栻主编：《严复集》（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5—15页。

² 康有为：《上清帝第二书》，《康有为政论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31页。

³ 梁启超：《南海康先生传》，《饮冰室合集》文集之6，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62页。

地幼学教习“蠹陋野悍、迂谬猥贱”，在《变法通义》之《论幼学》中开篇疾呼：“非尽取天下之学究而再教之不可，非尽取天下蒙学之书而再编之不可。”¹此时，朝廷上下对于育才兴学的呼声也不断高涨，如1897年梁启超在倡导创办女子学堂时说：“甲午受创，渐知兴学，学校之议，腾于朝庑。”²1898年春，张之洞在《劝学篇》（英译为《中国的一线希望》）中深忧“今日之世变，岂特春秋所未有，抑秦、汉以至元、明所未有也。”³他认为“窃惟古来世运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里在学。”⁴并且明确意识到“西国之强，强以学校”，⁵强调坚守“讲西学必先通中学，乃不忘其祖也，”⁶同时呼吁“沧海横流，外侮渐至，不讲新学则势不行。”⁷1901年12月，清廷在《为切实举办

¹ 梁启超：《变法通义·论幼学》，梁启超著；绿林书房辑校《梁启超书话》，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69页。

² 梁启超：《倡设女学堂启》，《饮冰室合集》文集之2，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20页。

³ 苑书义、孙华峰、李秉新主编：《张之洞全集第11册著述诗文书札附录》，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9704页。

⁴ 苑书义、孙华峰、李秉新主编：《张之洞全集第11册著述诗文书札附录》，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9704页。

⁵ 苑书义、孙华峰、李秉新主编：《张之洞全集第11册著述诗文书札附录》，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9705页。

⁶ 苑书义、孙华峰、李秉新主编：《张之洞全集第11册著述诗文书札附录》，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9705页。

⁷ 苑书义、孙华峰、李秉新主编：《张之洞全集第11册著述诗文书札附录》，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9726页。

大学堂谕》中开篇指明：“兴学育才，实为当今急务。”¹且兴办教育“全以教科书为胜败”。²其实，早在戊戌变法前，管学大臣孙家鼐在奏请译书局编纂各书时就提出：“学堂教育人才，首以书籍为要。”³1902年正月，另一位管学大臣张百熙在《奏筹办京师大学堂情形疏》中明确强调：“故学堂又以编辑课本为第一要事。”⁴于是，近代历史重大的变革关头，全社会寄希望于教育，教育寄希望于全新的教科书，编写出版教科书成为当时表达危机思想的一个方式，教科书被赋予了救亡图存、复兴民族的刻不容缓的神圣伟大使命。

文化是一个民族与国家的标志，是一个社会制度存在的根基，是人们安身立命、身心和谐的基本。教科书作为教学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现代课程实施的载体、拥有全国最大受众市场的读本，从本质特性上说，是按照一定目的，以文化信息为基本载体，有意识地确立文化标准的文本。⁵文化的种类有很多划分方式，英国学

¹ 北京大学校史研究室编：《北京大学史料第1卷 1898—1911》，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51页。

²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赵尔巽档，胶片号9，拍摄顺序号2，卷54。

³ 北京大学校史研究室编：《北京大学史料第1卷 1898—1911》，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90页。

⁴ 《光绪二十八年正月初六日（1902.2.13）张百熙奏办京师大学堂疏》，转引自朱有璇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2辑上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835页。

⁵ 吴小鸥著：《教科书：本质特性特在？——基于百年中国教科书的几点思考》，原载《课程·教材·教法》2012年第2期，第62—68页。转载于《人大报刊复印资料·教育学》，2012年第6期，第111—117页。

者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将同一社会内部的文化分为主导文化、残余文化及突生文化。“主导文化代表着在社会发展中的某一时刻,拥有最大权力的阶级或集团的利益和价值。残余文化是指过去形成的经验、意义和价值,在过去通常是作为主导文化而存在着的文化,虽然现在已经不属于主导文化的一部分,但仍然是被体验和实践着。残余文化之所以能够继续存在,主要是因为过去的社会或文化制度依然存在。突生文化是指与主导文化相对立的新的意义和价值,它们构成了文化的未来取向。”¹一般而言,教科书在过程演变中常常选择主导文化及突生文化为标准,在主动介入中需要利用技术手段处理原初文化信息,在现实情境中通过教学实践理解与创新文化标准。正因为如此,教科书自身便具有了神圣不可侵犯的文化价值规范与模铸人思想、制约人行为的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教科书的话语实践本身就是历史文化事件,其对于后世的影响比某些战争更加深远。梁漱溟曾说,“百年前的中国社会,如一般所公认是沿秦汉以来两千年未曾大变过的。我常说它是人于盘旋不进状态,已不可能有本质上之变,因此论‘百年以前’差不多就等于论‘两千年以来’。”²这种“未曾大变”显然是与传统封闭社会中由“三、百、千”进而“四书五经”等传

¹ 萧俊明著:《文化转向的由来——关于西方文化概念、文化理论和文化研究的考察》,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233页。

² 梁漱溟著:《中国文化要义》,香港:集成图书公司,1963年,第11页。

统教学用书所确立的文化标准相联系。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是一个忧思中国现状、叩问中国文化、设计中国未来的时代。各界普遍感受到了民族存亡与文化存亡的关系，认为文化危机是更本质、更深刻的民族危机。于是，在那些伴随着紧迫的民族危机感与焦灼的救亡意识的特殊时空里，传统的启蒙读本已经远远滞后于社会时代发展的步伐而“不宜教科”¹时，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以深沉的历史感和高瞻远瞩的自觉意识，用激情与灵感及我们难以想象的热诚，将自己对历史、对世界、对人生的总体理解和把握熔铸在一本本小小的教科书中，确立新的文化支点和标准。例如，1912年《教育杂志》第四卷第一期刊登了商务印书馆《编辑共和国小学教科书的缘起》一文，阐述了这套教科书的编辑要点，现抄录如下：

一、注重自由、平等之精神，守法合群之德义，以养成共和国民之人格。

一、注重表彰中华固有之国粹特色，以启发国民之爱国心。

一、注重国体政体及一切政法常识，以普及参政之能力。

一、注重汉、满、蒙、回、藏五族平等主义，以巩固统一民国

¹ 张元济著：《中国历史教科书》，上海：商务印书馆，1903年，序。

之基础。

一、注重博爱主义，推及待外人爱生物等事，以扩充国民之德量。

一、注重体育及军事上之知识，以发挥尚武之精神。

一、注重国民生活上之知识技能，以养成独立自营之能力。

一、联络各科教材，以期获得教授上之统一。

一、各科教材俱先选择分配，再行编辑成书，知识完全，详略得宜。

一、各科均按照学生程度，循序渐进，绝无躐等之弊。

一、关于时令之材料，依阳历编次。

一、各书均编有详备之教授法，以期活用。

一、书中附图及五彩画，便与文字相引证，并以引起学生兴趣而启发其审美之观念。

一、初等科兼收女子材料，以便男女同校之用。¹

凝重的印记，铭刻了多少天翻地覆的沧桑，传递着遥远而清晰的信息。中国近现代教科书从《国文》到《国语》、《作文》，从《修身》到《社会》、《公民》，从《理科》到《自然》、《常识》，从《体操》到《体

¹ 《编辑共和国小学教科书的缘起》，《教育杂志》第4卷第1期，1912年4月。